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

作者：周智生 责编：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06期　发布时间：2021-04-29　点击量：1135

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及川边新政的推行，是清末新政中的一次重大改革，对后世治边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围绕川边改土归流和治理、川藏关系、川滇边务、川边改革等专题已展开诸多研究，但多关注新政在川边的推动及对川藏边务的影响，而对川滇边区之间实际的边务筹谋和实施情况关注不够，给世人以清末川滇边务只关注川边而与滇边无涉的错觉。①

事实上，围绕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问题，清廷上下自马嘉理事件之后一直有争论，最终在巴塘事变后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以推行川滇边区协防同治，以因应西藏时局变化。川滇边务大臣设置之后，不仅对川滇边务有整体筹谋，也有着层次丰富、界面多元的具体边务活动。有鉴于此，本文对清末特别是川滇边务大臣设置后川滇边区联防和联治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希冀进一步丰富清末边疆治理研究，为学界全面把握和认识清末川滇边务全景及其影响提供参考和借鉴。

① 陈一石：《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２期。张秋雯：《丁宝桢川督任内对藏局的因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２５期，１９９６年。李细珠：《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１７７４－１９２５》，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英属印度的战略边界计划与赵尔丰、程凤翔对察隅边防的巩固》，《南亚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秦和平：《对清代民初中央政府在西藏东南地区加强统治的认识》，《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１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２０世纪初清政府对西藏察隅等地查勘及建制简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潘崇：《锡良与清末川边新政》，《民族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清末川边治理之一瞥———以锡良、刘廷恕关系演变为中心》，《西藏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本文所论川滇边区，主要是指今天与西藏毗连的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其中以川边的巴塘、里塘（今名理塘）、乡城、得荣、稻城等地与滇边的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县）、维西、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县）一带为论文涉及的重点区域。

一、　因应西藏变局：清末川滇边区联防与联治议论之由来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马嘉理事件之后，根据《中英烟台条约》，面向缅甸的滇边门户洞开，而且根据《中英烟台条约另议专条》，①英国人获得了在川藏腹地游历行走的权力，川藏门户也被打开，由滇而及川藏的安防问题进一步突显，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极大不安。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为阻止外国人借由条约入西藏游历，西藏地方政府依例通过驻藏大臣松溎向清廷奏咨：“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辞，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黄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② 根据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禀奏，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甚至威胁四川巴塘等地土司“将各处洋人逐去，出具永不进藏切结，否则直至巴塘，驱逐洋人，焚毁教堂”。③这表明，滇边和藏边危机的深化和扩散，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四川，而且在“瞻对之争”中川藏关系趋于紧张，丁宝桢较早洞察到英国人觊觎西藏即将给滇、川两省带来的危机和影响，“臣谓英夷之祸，幸而不发则已，不幸妄动，其害更甚于法夷，而滇、蜀必首当其冲”。④为了因应变局，丁宝桢提出了川藏一体的安防观，“且查川省门户在前后藏”，⑤而英人所据印度“近在西藏肘腋，稍一有事，即掣动全川脉络”，⑥ “设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终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⑦ 因此，丁宝桢将西藏边防与四川边防结合起来，提出了“固川保藏”的初步设想，奠定了清廷“固川保藏”的认识基础，开启了加强川藏经营，进而“筹边援藏”的先河。⑧

丁宝桢的“固川保藏”虽更多体现出加强川藏防务的构想，但其加强川西南巴塘、里塘一带防务以就近兼顾滇防的设想中，已暗含川滇边区联防的想法：“今英、藏设将有事，川省自不能不预备以固边圉。而道路之遥远如此，粮饷之艰难又如此，若由川省劳师远涉，诸凡掣肘，有损无益。臣与在省司道文武酌定核议，拟在四川紧接藏中边防内自行筹办，断难及远。兹拟于巴塘驻

① 《直督李鸿章奏与英使在烟台议结滇案折》，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７册，第１８页。

② 《松溎译缮西藏大众立誓不准外国人入藏公禀结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册，第１０５９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１１２，光绪六年四月丁巳条，《清实录》第５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４６页。

④ 《英人窥伺后藏预为筹备片》，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２４页。

⑤ 《英人入藏探路用意狡谲请密饬驻藏大臣修好布鲁克巴以固藩篱片》，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４９０页。

⑥ 《遵旨筹议裁减勇营局费折》，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５２６页。

⑦ 《西藏通商事多后虑折》，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５３０页。

⑧ 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１８７６－１８８６）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勇二千人，又于里塘驻勇千余人，以为策应，藉壮声威。且英人现有事于云南，此处驻兵亦可就近兼顾”，①希望以此来实现其“内可以捍卫川疆，外亦可援应西藏”② 的战略目标。可惜丁宝桢不久死于任上，其主张和策划功亏一篑，“非独西藏之不幸，亦中国之大不幸也”。③

光绪十四年英国人第一次入侵西藏后，清廷因在西藏地方抗英问题上处置失当而威信渐失，西藏地方政府“自保意识”渐生，而英、俄在西藏问题上不断干预和渗透，使得多重压力下的藏事陡然紧张。“藏事孔棘，祸机已伏，藏番冥顽倔强，隐有所恃，致有轻藐抗拒情事”，④ 迫使清廷不得不认真考虑川藏边区这个预防藏边危机扩散前沿地带及“固川图藏”前进基地的有效治理问题，而与川藏边区成片连线的川滇、滇藏边区联防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清廷在治藏问题上重点考虑的议题。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在时任川督鹿传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从西藏地方政府手中收回“即藏中一旦有事，此地已归川属，亦有门户可守”⑤的瞻对（今四川新龙县）时，川省给事中吴光奎在《藏事孔棘宜筹备御折》中向清廷建议不仅要重视瞻对，而且认为川西南的里塘、巴塘一带为四川入藏门户，也应该充分重视，尽早予以开发治理。“该给事中请于该处设立汉官，假以事权，招徕川省商民前往垦荒，并采办矿产各节，系为预杜窥伺起见”，清廷“著鹿传霖确查里塘、巴塘一带情形，如能招徕商民，垦荒开矿，洵于时局有益。并著文海、讷钦会商妥办”。⑥ 吴光奎上书不久，清廷即要求鹿传霖考虑加强川滇藏边区联防的建议：“即著该督等细心筹画，并查明由滇通藏道路，斟酌妥办。”⑦但对于吴光奎有关经营川西南边防的建议，鹿传霖进行了驳斥，认为“该给事中所请于里塘、巴塘酌设汉官，招徕商民，垦荒开矿，并于雪山分驻防营各节，似多窒碍难行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巴塘、里塘一带改土归流的条件不具备，“查里塘、巴塘各土司，皆原有粮员营弁管辖镇抚。今再设汉官，势必改土归流而后可。惟各土司世守之地，非其十分苛虐，土民怨愤，急思内附，断难无故更张，致令群相惊疑，辗转勾结，反开边衅。虽近年各土司弱肉强食，不无蛮触相争之事，然必其有罪可讨，有隙可乘，然后慑以兵威。如目前之瞻对、朱窝（今四川甘孜县境内），敢于叛乱，则径可改流。此外各土司殊难概论”。⑧ 在鹿传霖的坚持下，清廷只好“即据鹿传霖等查明事多窒碍，即着毋庸置议”⑨而作罢。

当时鹿传霖对于川滇交界处的治理思考，更多注意的是收复瞻对以保川境，而在川滇边区这个尚未有明显动静却又情形复杂的地区强行改流设置，显然还不在其施策考虑范围。在吴光奎的奏疏中还特别提到滇藏与印缅交界野人山一带的树浆厂，认为该地牵涉川滇藏三地安防，建议清廷预以防范，提早治理。光绪十七年，曾奉薛福成之命考察滇缅印边境情况的姚文栋归滇后将其考察情况汇编成册，并于光绪十九年经云贵总督王文韶上奏清廷，其中已指出树浆厂

① 《筹备川省边防折》，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５３４页。

② 《丁宝桢奏英人铁路已修至大吉岭窥藏端倪已露川省预为筹防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１０６６页。

③ 《丁宝桢藏事奏牍跋》，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５３７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３９４，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己巳条，《清实录》第５７册，第１３５页。

⑤ 《鹿传霖密陈瞻对亟应收回改设流官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６页。

⑥ 《吴光奎奏藏事孔亟宜筹备御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册，第１３３页。

⑦ 《清德宗实录》卷３９４，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己巳条，《清实录》第５７册，第１３５页。

⑧ 《会筹保川图藏并议复吴光奎疏》，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９９３页。

⑨ 《清德宗实录》卷３９４，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己巳条，《清实录》第５７册，第１３５页。

的区位重要性：“所谓树浆厂者，在西藏之南，云南之北，四川之西，跨大金沙江、龙川江、潞江直至澜沧江，凡诸江上流皆是也。……以地势而论，当滇、蜀、藏三省之凹，其三面皆与诸边毗连，为藩篱锁钥之要地。”①可惜当时川省距该地遥远，不能及时了解情况，也缺乏和滇省在边境情报上的交流和共享，因此未能促成鹿传霖予以重视，只是以“详查博访，不知其地。…… 臣等惟有随时设法图维，严防后患”②为由带过，没能及早关注和经营。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侍御史高燮曾也就全面加强川边防务上书清廷，他一方面强调瞻对关系川藏大局，应该尽早收回归川；另一方面提醒对于川西边防不能只盯着川藏边区，因为英人不仅在廓尔喀一带谋求深入，也在其他地方寻找突破口，“英人于滇边地方测量道路，所过土司俱胁令归附，惟遇有汉官驻扎处，则止不复前。盖以其正名为中国地界，彼虽贪狡亦无词阑入也。然则为固圉计，非于边界设官不可”，而“现在打箭炉厅止设同知一员，职分未崇，难资控驭”，因此建议在“里塘、巴塘、江卡（今西藏芒康县）、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县）等处，安设台站粮员”，“于厅城设分巡道一员，统辖里巴江察各粮员，兼管炉关及矿务茶务”，在增设流官的同时，建议“再于里塘以南与云南中甸接壤处设文武官员一二员，永远驻守，以杜英人窥藏之路，庶几门户严密，外患潜消”。③高燮曾上书后不久，十一月初十光绪帝再次下旨要求鹿传霖等讨论统筹川藏全局背景下川滇交界地区统一设防问题：“另片奏：‘请于打箭炉厅城设巡道一员，再于里塘以南与云南中甸接壤处设文武官一、二员，并将阜和协副将改设总兵，或径令移扎里塘’等语。著鹿传霖一并妥议具奏，原折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④ 鹿传霖等川省官员合议后很快进行了回奏：“再查云南维西协属之阿墩子汛地方，界接巴塘辖境，左临澜沧，右挹金沙两江，潆洄最关紧要。闻近年英人由阿萨密修造铁路，直达缅甸。其铁路横经之处，距阿墩子仅四五日程，似宜于阿墩子移置重

镇，以固疆圉。拟请旨饬下云南督抚臣，与臣会商，应如何于川滇交界各设文武员弁之处，公同妥议奏明办理。如此通筹建设布置，使川省关外与内地声息相通，再将电线展通，于前藏消息愈灵，无事则边地相安，有事亦筹防较易。”⑤虽然清廷上下经过多次议论，在川滇交界区加强联防以扼制英国人势力由滇入川的重要性上逐渐达成共识，但只是着眼于“固川保藏”前提下加强川边与滇相邻地区的防守筹谋，在如何具体推进联防问题上还缺乏可以落地的施策。特别是清廷在收回瞻对问题上迟延反复，导致川藏防务全局统筹之下推进川滇边区联防问题被拖延了。

光绪三十年，英军再次入侵西藏并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北走，英军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签订所谓的“拉萨条约”，藏中局势更形混乱，给清廷造成极大震撼和不安。与此同时，英俄侵略势力的“关注眼光”也拓展到川滇藏边区，觊觎之心显露无遗，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的英国《先锋报》直接挑明“喀木”（康区）对于扩大英国贸易有重要意义。⑥综合研判国内外局势，清廷于光绪三十年八月旨令移驻察木多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和新任西宁办事大臣延祉，“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凤全认真经理，北至青海界一带著延祉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①由此，除了推进藏中改革，清廷开始着眼于加强西藏与川、滇、青交界地区的治理经营，以尽快解决川滇青边区入藏不畅、支援不力的问题，“重点是先解决‘饷源’的财政问题，其后才是渐次推及政治改革”。② 因此，在给凤全等人的上谕中，清帝还特别嘱咐“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未显示出更迭旧制、改流设官的迫切感。

①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卷上《树浆厂考》，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第５３－５５页。

② 《会筹保川图藏并议复吴光奎疏》，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９９４页。

③ 《高燮曾侍御禀请收回瞻对建置汉官疏并请改设文武各员片》，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１０２６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３９７，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辛丑条，《清实录》第５７册，第１９０页。

⑤ 《复奏统筹川藏全局增移镇道并瞻对等处改流疏》，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 《清代藏事奏牍》，第１０２３－１０２４页。

⑥ 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１８８８－１９１９）》，张方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7页。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凤全在巴塘被杀，其后巴塘民众捣毁教堂，一路追杀法国传教士到阿墩子等地。“巴塘事件”在川滇边区不断蔓延，演化为席卷盐井（今西藏芒康县）、阿墩子、奔子栏、维西、贡山等川滇藏边区的大规模教案，迫使清廷筹边援藏的重点关注区域由川藏边区的瞻对等地转移到川滇与西藏交接的巴塘、中甸一线。先前为了安抚“番众”，以经济开发为先导的战略步骤被打乱，最终演化为川督锡良主导，赵尔丰、马维琪等全力推进落实的武力改流。

鉴于“巴塘事件”显示出川滇边区的复杂性，在对平定后的巴塘等地如何进行改流的问题上，清廷内部和社会议论众多。第一种建议着眼于川藏边区来筹划布置，主张“将四川划为两省，分设川西巡抚以董理之，而仍受成于总督”；③第二种建议由内阁中书尹克昌提出，建议划出四川雅州、宁远、打箭炉、巴塘、里塘、明正、瞻对到云南丽江、永北、永宁一带，设为“建昌行省”，开展“屯垦、兴学、设官、练兵、置警察、通道路，隐杜外人得步进步之心”，“建昌为西藏之咽喉，而丽江尤为川滇缅藏之门户，今以此境分隶两省，实阂隔边情，一旦有事照料莫及，诚非另设一省，镇以贤能必不能布置周密收吏治安边之效”。④ 尹克昌的方案，不仅考虑了川藏边区，而且强调川西南与滇西北的整体性和统筹治理的重要性，范围更广，省际跨度更大；第三种建议由姚锡光提出，建议“于川藏之交大金川、大小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五大水流域之中，以全力经营，比照西北边防各大臣或江北提督成案，姑设川西边务大臣或提督”。⑤ 上述三种方案都是时人对清廷试图经营川边以达“筹边援藏”战略的具体响应。尤其尹克昌和姚锡光的方案，强调打破川滇省域行政限制，以新设专门行政机构及官员的方式加强川边和滇边的整体联动治理，这对一心想要协调川滇以加强管控西藏能力的清廷而言，无疑更富于借鉴性。

二、 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及其边务经营策略

（一）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廷要求川督锡良等考虑川边建制调整问题，“巴、里两塘距省过于辽远，究属鞭长莫及，宜有文武大员常川坐镇，方足以资控制而固藩篱。若于该处一带添设镇、道各一员，并将四川提督移驻川西，庶几消息灵通，声威自壮，地方屯垦、工艺诸事亦可次第振兴。寓兵于农，整军经武，以期一劳永逸，边圉　安，实为未雨绸缪之要计。著锡良统筹全局，悉心详核，提镇道员应分驻何处”。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锡良联合成都将军绰哈布奏请设置川滇边务大臣，推动川滇边区联治：“打箭炉西至巴塘、贡噶岭，北至霍尔五家，纵横各数千里……边事不理，川藏中梗，关系至大。征之前事，藏侵瞻对，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闻战，藏危边乱，牵制全局者，皆边疆不治，道途中梗之所致也。……臣等详筹，乘此改土归流，照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① 这一方案显然有尹克昌和姚锡光建议的影子，跳出在川言川的局限，建议在更大的空间统筹治理问题。在川滇边务大臣的具体人选上，锡良直接给出了推荐建议，奏请在巴塘办理善后事宜的赵尔丰担任川滇边务大臣之职：

① 《清德宗实录》卷５３４，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条，《清实录》第５９册，第１１７页。

② 吴彦勤：《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２页。

③ 《筹藏论》，《南方报》１９０５年8月２０日。又见《东方杂志》第2卷第１０期，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１日。

④ 《内阁中书尹克昌奏请添设建昌行省折》，《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１９０５年8月２５日。

⑤ 姚锡光：《筹藏刍议》，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第２１页。

⑥ 《清德宗实录》卷５４９，光绪三十一年九月辛未条，《清实录》第５９册，第２８５页。

“赵尔丰由建昌道为炉边善后督办，平定巴塘、乡城，改土归流，设官分治各端，甚合机宜。请旨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进驻巴塘练兵。”② 七月三日，清廷采纳锡良建议，设置川滇边务大臣，而且着重强调川滇边务统筹治理之要：“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若于该两省边疆开办屯垦、广兴地利、选练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离，实为今日必不可缓之举。四川建昌道赵尔丰著开缺，赏给侍郎衔，派充督办川滇边务大臣，居中擘画，将一切开垦防练事宜切实筹办。”③川滇边务大臣以巴塘为驻地，边务经费主要由清廷划拨江汉等关税和四川省税收，“经清廷核定，拨重庆关银三十万两，江汉关洋税银二十万两，又江海关存税款拨四十万两，共一百万两作边务开办费。常年经费，则由四川增收棉、油、糖税内，每年拨给四十六万两”。④

川滇边务大臣的正式设置，标志着清廷对川滇边区的治理策略从“固川保藏”这一加强省域关系战略实际细化调整为“筹边援藏”战略，充分体现了清廷上下在应对西藏危机问题上冀望加强川滇协力，推进川滇藏边区统筹治理以支援西藏的意图。丁宝桢、鹿传霖等人提出川滇边区的联防问题，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预防英国势力由滇边乘隙入川，而清廷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则试图推动川滇边区联治，已经从单纯加强滇边与川边之间的战略防守，演化为合川滇之力共同推动“筹边援藏”国家战略的实现。

（二）川滇边务大臣的经营策略

１．关于川滇边务中的滇边范围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赵尔丰拟任川滇边务大臣前，清廷就川滇边务大臣的辖境问题表示了特别关切，“川、滇两督会商川滇边务大臣所辖以何处为界？西至何处为止？每年经费若干？分条详奏，以凭办理”。⑤同年八月，任职不久后的赵尔丰在给川督锡良的报告中提出了川滇边务下辖的基本范围，“复查巴、里两塘，地方辽阔，北由瞻对，南至云南之中甸，东西各千数百里，人烟稠密，土地沃野，诚为关外之奥区。早应收回，擘划经营，设为重镇，以备治边援藏之基础”。⑥在此申报中，赵尔丰大致以北至瞻对、南至中甸一带为辖境，至于东西虽“各千数百里”，则尚未具体明确。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有关川滇边务应办事宜的奏折中，赵尔丰在谈到设官、屯垦、巡防等边务如何开展时，也提到了滇边维西、中甸等地。①虽然清末川滇边务未能如赵尔丰所请“川边、滇边由两省督臣划定地界，应自某处起归川滇边务大臣管辖”，② 但从其治边考量中，川滇边务涉及滇边的地域范围基本是明确的，主要即中甸、维西一带。

① 《锡良、绰哈布奏设川滇边务大臣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９０页。

② 《军机处遵旨交部议复锡良等奏设川滇边务大臣请以赵尔丰充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９１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５６２，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戊戌条，《清实录》第５９册，第４３３页。

④ 冯有志：《西康史拾遗》，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０页。原文如此，经核算各关税银总额１００万两合计实为９０万两。或为手民之误，江汉关税银２０万两应为３０万两。

⑤ 《军机处遵旨交部议复锡良等奏设川滇边务大臣请以赵尔丰充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９１页。

⑥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申报锡良巴、里塘改流设官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９２页。

清廷一直重视滇边中甸、维西等地在川滇藏地区治理中的作用。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康熙帝在给兵部的上谕中特别强调中甸的战略地位，认为“中甸最为要地”。③ 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在积极准备平定入侵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同时，康熙帝又谕示议政大臣等：“见在西边用兵之处，与云南及打箭炉地方道路相通，应预为防备。”④康熙五十九年三月，云南提督张谷贞疏言：

“云南之丽江、中甸一带地方，为西藏通衢，最系紧要，臣请亲率官兵，于丽江、中甸处适中之处，驻扎防守”，康熙帝从之。⑤雍正初年，川、滇、藏正式勘地划界，为更好发挥中甸、维西等地的治边作用，“收巴塘、里塘隶四川，设宣抚司治之；中甸、维西隶云南，设二厅治之”。⑥ 雍正八年（１７３０），怒江、独龙江一带的怒族、傈僳族、独龙族前来归附。时任云贵总督鄂尔泰奏禀：“怒子等群生感激，相率来维，鹿皮二十张，山驴皮十张，麻布三十　，黄蜡八十斤，烦通事禀请，愿将此土产，作赋永归。”⑦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维西厅不仅羁縻澜沧江外的怒江、独龙江等地，其影响还深入到了中缅未定界的野人山地区。晚清姚文栋在《云南勘界筹边记》中谈到野人山树浆厂一带归属问题时，还特别将该地怒族于雍正八年归附之事作为内属之依据，“皆云于雍正八年归附，以虎皮、麻布、黄蜡等物充贡，永以为例，盖皆内属之地也。其间金矿之富，树浆之饶，边内外民皆艳称之，号为陆海。……岂可委之于外人乎！此地与缅境相去约二千余里，中隔孟拱、孟养两土司，自古以来未尝属于缅也”。⑧ 维西在中缅印交角地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阿墩子虽属维西厅，但为滇藏要冲，因此清廷也较为关注。嘉庆七年（１８０２），专门封禾良斗为世袭阿墩子土千总，世居阿墩子，其辖区“东至路卡接壤叶枝二百四十里，南至察利坡接壤川界一百里，西至叙工村接壤西藏二百里，北至必用工村接川界二百里”。⑨１９２１年成书的《滇边要路略》曾这样描绘阿墩子：“阿墩为云南入西藏之孔道，川边之保障，全滇之屏藩……左流金沙江，右流澜沧江，阿墩雄跨中处。东界川边德荣、巴塘等县，南界维西县，西界西藏属毕土擦阿龙，北界川边盐井县，东西蹙南北长，纵计七百余里，四面交通邻境，广阔皆无市镇，墩

① 《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② 《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２２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９８，康熙二十年十月至十一月甲申条，《清实录》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３３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２７４，康熙五十六年九至十月甲辰条，《清实录》第6册，第６９０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２８７，康熙五十九年正月乙丑条，《清实录》第6册，第８００页。

⑥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５２５《藩部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４５４０页。

⑦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孟连土官刀派鼎愿纳厂课银两及怒江夷人愿纳土产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８册，第５１０页。

⑧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卷上《树浆厂考》，第５４－５５页。

⑨ 龙云、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１７６《土司考四·丽江府》，牛鸿斌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7册，第７２６页。

境诚为川藏冲要之门户，商贾云集之巨市，军政外交之关隘。”①

赵尔丰对川滇边务中滇边范围的划分显然有过深思熟虑。例如，其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所上《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中反复强调维西和中甸，只字不提丽江。而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署四川提学史方旭、四川藏文学堂监督熊承藻呈送锡良的《拟订藏文学堂章程》中，所划出的川边和滇边具体范围则包括丽江在内。② 这是为何？我们认为，赵尔丰可能主要考虑了两点：其一，川滇边务大臣乃一时新设，摊子不能铺大；其二，清代丽江府辖地广阔，不仅其西北所属的维西厅和中甸厅连接川藏，而且东面所属的永北厅连接四川西昌一带，这给曾在当地任职的赵尔丰留下深刻印象，“山居野处，向无酋长，时出劫掠，边民苦之”，③ 如果贸然将丽江整体纳入，无异于自加负担。赵尔丰在奏折中说自己所陈建议系“云贵督臣锡良在川时，已将川、滇边情形，与臣悉心商酌”，④所言确实是对川滇情形预先有过认真考虑和务实筹谋。

２．关于川边与滇边的统筹治理策略

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之初，就对川滇两省交界边区的治理进行了统筹考虑：“川滇边地辽阔，论者皆谓宜分设行省，以责专成。此时开办之初，奴才诚不敢遽议及此，稍涉铺张。然权限疆界，亦有不能不预为筹定者。缘边地距川、滇省治均各三、四千里，遇事相商，固多迟缓，且彼此亦均有不能洞悉情形之苦。至用人之法，全在取舍黜陟，若边地各官仍各分隶两省，则贤者不免涉于瞻顾，不肖者更将肆无忌惮，因缘为奸。边务大臣不过徒拥虚名，安能于事有益。拟请川边、滇边由两省督臣划定地界，应自某处起归边务大臣管辖，此后地方各事及差缺各官升迁更调，均归边务大臣主政。其籍隶川滇人员，但非在边务大臣所管境内者，均准通融委用，以广其途，遇有重要事件，仍随时会商办理。如此则责任既专，整顿自易。”⑤

关于川滇边区的设官问题，赵尔丰认为，“又如设官一节，滇边维西、中甸本已设厅，川边巴塘、里塘、乡城等处应各设管理民事流官”。⑥ 很明显，其整体考虑到了川滇边区的设官治理问题。如上所述，川边特别是川藏交界区是改流设官的重点区域，但滇边中甸、维西一带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如中甸自雍正二年改流之初，除中央任命流官任州判、通判、同知外，其下官员“由夷众公举悦服者拨补，听守土文武流官管辖，非世袭”，⑦ 其后一直延续，是典型的 “土流并存”、“土流并举”，清末以后流官管理逐渐空疏，“地方利权及词讼事悉是喇嘛主持”。⑧ 赵尔丰的川滇边务改革，重点不在改良川滇边区已设流地区，而是在“筹边援藏”的核心前提下先行解决川边未改流地区，是“打补丁”、“填空白”式的改流，所以将重点放在巴塘、里塘一线有其缓急指向。从赵尔丰就任川滇边务大臣之初所提开办章程，很明显可以看到对川滇边区整体治理“预为筹定”①的特点。

① 王沛霖：《滇边要路略》，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５册，第３９１页。

② 原文是：“川边为炉、里、巴三台站。滇边为丽江、维西、中甸、金沙江流域。”（《署四川提学使方旭、四川藏文学堂监督熊承藻会详锡良拟订藏文学堂章程》，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９５页）前引光绪三十一年内阁中书尹克昌也建议清廷在川滇边区设置上考虑将丽江一带纳入。

③ 《赵尔丰传》，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页。

④ 《川滇边务事宜均关紧要据实缕陈拟具章程折》，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５０页。

⑤ 《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⑥ 《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２１页。

⑦ 王文韶修：《续云南通志稿》卷９９《土司》，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３５７页。

⑧ 王沛霖：《滇边要路略》，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８５册，第３９０－３９１页。

维西、中甸一带的滇边驻防问题，历来受清廷重视。雍正五年，清廷应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移鹤庆府通判于维西。设维西营，驻兵一千名，以参将统之”。②光绪三十一年川滇边区教案爆发，绿营兵在与川滇起事边民的交锋中屡战屡败，使清廷认识到滇边绿营兵的战力低下。于是在１９０６年，于阿墩子专设弹压委员，专驻阿墩子办理行政事务，并新派防军一营加强戍守。这与川边改流基本同步，是清廷力图实现川滇同举、互为掎角的举措。赵尔丰为了加强川滇同防，做了进一步布置设计：“查川滇边地，西连藏卫，北接青海，南尽蛮夷，纵横约各二、三千里。山川险要，驿路綦长，在在皆须派兵驻防。现只就川边巴、里两塘及乡城、稻坝、贡噶岭而言，原有巡防新军五营，尚苦不敷分布，安能以三营而兼顾川滇”，因此，“计川边现设巡防五营，滇边约须巡防三营，庶敷分布”。③ 在赵尔丰眼中，滇边要在筹边援藏中发挥更大作用，原绿营兵难以堪用，阿墩子现只有一营新军明显不够，“约需巡防三营”是其增强滇边防务的具体规划。

无论是设官还是巡防，作为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统筹兼顾了川边和滇边，也确实想要按清廷在川滇边务大臣设置上“广兴地利，选练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篱”④的要求，对川滇边区“通盘筹画”。但正如上述，无论是清廷还是赵尔丰，当时“筹边援藏”战略核心还是在于尽早完成川边作为援藏前进基地的建设，所以从一开始的筹谋到后来边务的具体推进，滇边显然都不是重点，只是作为川边的协防策应和拱卫之地加以关注和筹划。但是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赵尔丰奉旨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五月卸任，在近五年时间里，川滇边区亦非寂静之地，其间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边务事件颇值得关注和梳理，这为我们整体廓清和把握清末川滇边务开展的历史全貌提供了线索。

三、　川滇边务开展中的联防与联治

围绕川滇边务开展进程中边区突发事件的联合应对和中缅北段界务危机的协力同防，川、滇、边三方互通声息，相互协作，维护边疆安防稳定，确保川边改革的有效推进，反制英国对云南片马的入侵，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治理，充分凸显了川滇边务联防联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巴塘“三村”划归滇治

光绪三十三年，川边巡防军新军右营管带朱宪文会同滇军围剿在改流中举事反抗的巴塘巴拉、色葱两村，镇压后川滇合议将巴拉、色葱连带附近的依里划归云南丽江府中甸厅治理。⑤ 这是清末川滇边务改革中，唯一一次就川滇边区的行政辖区进行改隶。在光绪八年《新修中甸志书稿本》“乡村”条中还未见上述三个村名，但在１９３２年《中甸县纂修县志材料》“市镇乡村”中原属川边的三个村名已赫然在列。①

① 《川滇边务事宜均关紧要据实缕陈拟具章程折》，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５０页。

② 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９１页。

③ 《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２０－１２３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５６２，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戊戌条，《清实录》第５９册，第４３３页。

⑤ 段志诚主编，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中甸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大事记”，第１２页。

（二）联合维护边区稳定

１．共同平定浪藏寺之乱

在川边改流过程中，与滇边维西、中甸两厅毗连的巴塘浪藏寺，又名诺苴寺，有喇嘛千余名，周边八十余村，纵横五六百里，皆由该寺控制。自光绪三十三年巴塘改流以来，该寺僧众逼迫百姓，拒不投诚，且勾结里塘桑披岭寺为乱，危害边区安全。“该喇嘛怙恶不悛，四出劫掠，而欺侮滇边番民为尤甚。光绪三十三年竟大事猖獗，率众渡金沙江入滇边滋事。经云贵督臣锡良咨请饬边地派兵弹压，该喇嘛始行退回巢穴”，但其后该寺不知悔改，不遵投诚免罪的谕令，屡屡作乱，劫掠百姓牛马货物，频频入滇边中甸等地滋事，危害川滇边区。宣统二年二月，赵尔丰派新军统领凤山由巴塘、定乡两路进攻，同时派新军后营帮带莫立群率勇两哨，“会同滇边阿墩子委员夏瑚，饬土勇及居民沿江堵截该逆去路”，最终川滇合力，取得胜利，“两省边民之害，从此永除”。②

２．协力处置哗变逃滇边军

赵尔丰川滇边务改革，由于川边条件艰苦、战事紧张、治军严苛、后勤管理不善，边军哗变逃亡滇边事件多次发生。主要有三次：光绪三十三年巴塘兵变、宣统二年定乡兵变、宣统三年得荣兵变，三次兵变均在川滇联防互守中得到平息，但也成为影响边务治理的重大事件，突显了清末川滇边区复杂的社会镜像。

巴塘兵变。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河西腊翁寺喇嘛聚众叛乱，川边改流在盐井一带受阻，正待全力平息之时，巴塘左营哨弁杨瀚臣率队哗变，杀死左营管带许志霖后由稻坝窜入云南，一时谣言四起，震动全边。事后查明，时任新军五营统领吴俣任用其兄吴骐管理粮饷，但其兄威福自若，苛虐垦夫，克扣军粮，因而逼反左营哨弁杨瀚臣，酿成兵变。③兵变发生后，赵尔丰一边协同川督锡良致电滇督丁振铎请求派兵截堵，严行搜剿；④一边电令边军顾占文、苗玉龙率部追逃。杨瀚臣所带逃入滇的兵勇６０余人，均带快枪，“自出阿墩以来，沿途杀掠，至拖枝地方，经维西厅营带兵追及，逃勇开枪，我兵击毙逃勇一人，伤三人，遂纷纷溃散”。⑤ 其后逃勇一路向南，二月十三日窜入大理云龙、永平一带。奉命追捕叛兵的顾占文部进入云南大理永平城后，所率兵勇与逃勇串合，再次哗变，其势遂张的乱兵在永平、漾濞一带劫掠商号，抢掳居民，焚烧教堂，砍毁电杆，甚至一度想要进攻大理、下关等滇中形胜财赋重镇。⑥东犯下关未遂后，叛兵在滇军沿途截击下死伤大半，余众改装四窜逃散，先后在楚雄姚州、四川会理等地被滇、川军拿获。①接替丁振铎出任云贵总督的锡良曾在奏折中对叛兵最后肃清情形进行描述：“该逃勇冒死乘夜凫水偷渡，官军力蹙之，先后计擒斩沉溺共三十余名，复渡江会合川团搜获十四名，自是两省边界遂无匪迹。”②自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哗变，到五月初三赵尔丰电令帮带顾占文整顿余部回到盐井驻防，③其间祸乱时长近四月，波及云南丽江、大理、楚雄等府所属十余县，最终川滇合力才肃清此次兵变。这也是自雍正川滇划界以来，川边兵变首次殃及云南腹地，对滇边和滇中的震动极大。民国初年大理地方志曾对边军逃勇窜入当地记述道：“川边散勇约九十余人由云龙旧州一带窜至漾濞，掳掠居民。……散勇虽少，所携快枪甚利，子弹人各二三围，故迤西诸处大为震动。”④

① 吴自修纂：光绪《新修中甸志书稿本》“乡村”条；和清远修，冯骏纂：《中甸县纂修县志材料》“市镇乡村”。两书均系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中甸县志资料汇编》之三、之四，丽江：丽江印刷厂，１９９２年内部编印。

② 《收回巴塘得荣地方折》，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２０－２１页。

③ 《参劾吴俣张秉均片》，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④ 《致滇督丁振铎哨弁逃入滇境请派兵搜剿电》，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７５－７６页。

⑤ 《丁振铎致电军机处陈报边军兵勇逃滇及防剿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１０页。

⑥ 《丁振铎致电军机处陈报边军兵勇逃滇及防剿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１１页；并见《致军机处哨弁杨瀚臣私逃滇境代奏电》，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７５页。

定乡兵变。宣统二年八月二十日，因左营管带刘鸿宾性情太严，赏罚不公，苛虐下属，⑤ 边军左营驻定乡（今四川乡城县）左哨弁张占标带头，左、中、右三哨一齐哗变，“撞烂库储，所有军装子弹全行抢去，复捆姜委员，将粮署劫掠”，⑥ 抢走管带关防大印，并裹挟贡噶岭、稻城两哨同叛，“先拟由里塘进关，嗣闻改道中甸”。⑦临逃往中甸前，已被撤职留看管押的左营原统领吴俣也被一同带走。叛兵入滇之前，先在川边定乡一带大肆劫掠，“抢劫营中关防大令、饷项、枪弹并委员处公款银两，所有各局所什物概行扫掌罄尽”。⑧ 乱兵于八月二十五日进入滇边中甸厅后，“奈中甸兵力单薄”，⑨根本无力抵挡，不仅被攻陷，而且叛兵还据城不走，意图长久负隅顽抗。“据电奏，川兵窜扰滇境，中甸同知姚春魁、哨官钱尊贤被胁，并抢去铜本银、枪械，杀伤十余人……若非赶紧扑灭，必致裹胁蔓延，贻害地方”，清廷立命滇、川联合会剿叛兵，“著李经羲督饬各营，迅速兜剿防窜，并著赵尔巽、赵尔丰严饬各将弁，速遏叛兵归路，合力夹击，毋任滋蔓。所有姚春魁等下落及叛兵究竟如何起事情形，著该督等速即分别查明，据实电奏”。10定乡叛兵来到中甸后，在城中大肆劫掠，九月中旬临败退之际，还要挟中甸同知姚春魁等付赎城费１３００两白银方肯退走，无奈之下，中甸僧、俗各方议定分别承担，由铜务委员会和商会先行垫付。11九月十八日，在滇军和边军联合打击下，已无法在中甸立足的叛兵遂向东

① 《赵尔丰电复赵渊逃勇回窜会理已派兵堵截》，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１３页。

② 《遵查川省逃勇窜滇各情据实覆陈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整理：《锡良遗稿·奏

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2册，第７１５页。

③　《电顾占文带队速回盐井》，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７８页。

④　李春曦修，梁友檍辑：民国《蒙化县志稿》卷２２《人和部》卷之７《寇变志》，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４２２页。

⑤　《奏陈审明定乡兵变缘由及处理情形并请奖川滇出力人员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８４８页。

⑥　《统领凤山禀报驻定乡三哨兵变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７５５页。

⑦　《凤山禀续报定乡兵变各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７５６页。

⑧　《帮带丁成信禀报定乡兵变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７５９页。

⑨　《姜孟侯禀报定乡兵变被掴劫中途逃脱各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７７１页。

10　《宣统政纪》卷４２，宣统二年九月庚戌条，《清实录》第６０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７５３页。

11《宣统二年十二月中甸僧俗各界联名共立合同》，转引自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回窜川边石达，被顺势追击而来的滇、边、川联军合围，至九月二十八日，经十天连续奋战，叛军被彻底击垮，吴侯带５８人向滇军投降，张占标趁乱逃走。① 十月初七日，张占标在川边通甸被边军擒获。②至此，历时近两个月的定乡兵变被彻底剿灭。此次兵变，前后有巴塘三哨、稻城两哨官兵卷入叛乱，涉及兵勇众多，占据中甸城２０余日，最终在滇、边、川三地动用重兵联合打击下方才平息。对于此次滇、边、川联合出兵平叛，赵尔丰向朝廷进行了详细禀报：“此次叛兵窜扰云南，合川、滇、边三方兵力，始得迅速捕灭，不致蔓延，酿成大患，边军等系办本军之事，自应毋庸给奖。惟川、滇将弁迭次苦战，驰驱追剿，卒获首逆，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谕饬各该督臣，择尤保奖，以示鼓励。”③ 这确实是清末川滇边事中较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仅在石达一役中，边军叛兵被击毙６０名，滇、川、边联军阵亡１５名，伤３６名。④ 财产损失亦属不菲，据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赵尔丰给朝廷的奏折，仅川边定乡一地被叛兵劫掠一空的存储征粮变价银两，就达１５３８５两左右。⑤

得荣兵变。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哨弁刘志连、曾炳南等牵头，驻得荣３０余名士兵发动叛乱，抢劫得荣粮署公物钱粮。得荣委员丁成信一面汇报兵变情形，一面“仍命夷民将过滇溜索砍断，寄信云南文武员弁拨兵防堵”。⑥兵变引起得荣地方喇嘛和百姓的惊惶，为求自保，当地民众不仅将得荣委员拘禁扣押作为人质以震慑叛兵，而且在浪藏寺准备齐集后，向叛兵主动发动攻击，激战中领头的刘志连被喇嘛打死，寡不敌众的叛兵只好四散溃逃，十月二十八日，兵变基本平息。⑦此次兵变因规模小，波及少，并未如前两次一样造成川滇边区的大震动，其影响也自难与前两次相比。但这毕竟也是清末川滇边务中的三次兵变之一，“而关外三次兵变俱在左营，伊等实恃定乡、稻城、得荣等处与滇相接，与巴塘信息稽延，故见惯习惯，敢于如此”，⑧ 亲历此次兵变的丁成信的这番话，确实点出了三次兵变的共性，即主要是靠近滇边一带驻扎的左营官兵，而且哗变窜逃方向也都是滇边，显露了川滇边区动乱易于波及的实情；而川、滇、边三方合力协防迅速平息哗变，对于维护边区稳定、保障川边改革顺利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基于川滇联动，合力推进川滇边务改革的必要性。

（三）联合应对中缅北段界务危机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底，英军悍然入侵云南片马地区；１９１１年１月初占领片马。一时间，“滇边阽

①　《云南统领李德泳、四川统领董南斌、凤山会禀于石达地方攻剿叛勇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７８８－７９０页。

②　《凤山、董南斌会禀拿获叛兵首领张占标等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７９４－７９５页。

③　《审明定乡兵变起事情形折》，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１４７页。

④　《云南统领李德泳、四川统领董南斌、凤山会禀于石达地方攻剿叛勇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７８８－７９０页。

⑤　《定乡兵变劫去征粮变价银两请饬部立案准销片》，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８４４页。

⑥　《得荣委员丁成信详报顾占文得荣兵变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１３１－１１３２页。

⑦　《得荣委员丁成信详报顾占文得荣兵变情形》，并见《边务收支局详报顾占文得荣兵变请委员驰往安抚》，均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

１１３０－１１３５页。

⑧　《得荣委员丁成信详报顾占文得荣兵变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１３３页。

危，摇动大局”，①举国关注，舆论沸腾，纷纷要求清政府出兵收复失地。然而唯恐进退失据的清廷，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电寄云贵总督李经羲，只是要求他“审时度势，究未便轻启兵端。应由该督饬地方文武，妥慎防维，勿任鲁莽偾事。一面镇抚汉、夷，免生惊扰并著外务部磋商办理，以维边局”，②滇省边防压力陡然倍增。李经羲自上任以来，一直强调联络西南诸省协助滇防的必要性：“滇省三面临江，强邻窥伺，非联络西南诸省，厚集人力财力，整饬军防，不足以撑持危局。”③而此时，邻近省份之中，藏中局势依然危急，广西鞭长莫及，考虑到川滇边区紧邻滇缅边境北段，川滇边务在赵尔丰治理下已初见成效，边军军力雄厚，于是李经羲一边饬令李根源等人易服前往高黎贡山以西地区，勘测山川地貌，侦察英军的驻防情况，为尔后收复失土预做准备；④一边求助于川滇边务大臣和川督。

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川督赵尔巽将李经羲请求在勘界等方面予以协助的电文转给赵尔丰，电文言辞恳切，期望良多，“边事危急，蒙拯救拨协，感佩公志，仍恳从速。滇为恃协贫瘠政策，谋边为急。……案查滇缅界务，系属中英国界，英缅目的注重打通印缅，穿插藏地，关系至巨，非仅滇边。……疆臣责在守土，彼欲太奢，事关全界，断非滇省所敢妄主。……川滇唇齿，此事相关倍切，尤望次帅速赐教示，簇电金祷”。⑤ 此外，李经羲在专门给赵尔丰的电文中特别请求其派边军南下，进至高黎贡山一线，以阻止英军进一步行动，减轻云南边界的压力，“今季帅兵至桑昂曲宗，如南寻缅界，横断高黎贡山脉，使彼无所藉口，俾滇从容同谋一辙，以作犄角之势”。⑥对藏东南及滇缅边界问题一直关注的赵尔丰在得到李经羲电文后，很快于宣统三年正月回电：“滇缅界址，英执高黎贡岭为紫线，查此山与冬拉冈里岭同一山脉，以西为桑昂曲宗、杂瑜、波密、工布等处，已收为国有，犹非瓯脱之地。遵电已派人前往近缅甸之处勘查界址，俟图成后再为电达。”⑦赵尔丰也对滇缅勘界边务特别是片马问题颇为关注，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给川督赵尔巽有关西藏波密的电文中，表示深深的忧虑：“查英人前年侵藏，今又侵滇，系择其有利者是图，以为蚕食之计。片马不守，与藏不同，盖藏穷苦，地方辽阔，英人得之虽易，利之艰难。片马富庶，且近腾永，仲帅抗争迟之，早无防备，万难收回。”⑧ 鉴于西藏察隅等地“自滇缅划界，英指高黎贡山脉以西为瓯脱之地，今我不取，西藏万难扼守”，因此早在宣统二年十二月，赵尔丰就已派边军右营管带程凤翔，“先据桑昂以分宾主之势，俾使英人无所借口，树我藩屏，以纾民困，犹非拓土辟疆之举”，⑨开展了积极应对。

为了更好探查边境情况并安抚地方民众，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应李经羲请求，赵尔丰委派原滇边阿墩子弹压委员、新任川边科麦县（今西藏察隅县）知事夏瑚前往滇缅北段未定界

①　《宣统政纪》卷５０，宣统三年三月上辛丑条，《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８９１页。

②　《宣统政纪》卷４７，宣统二年十二月下壬辰条，《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８４２页。

③　《宣统政纪》卷３２，宣统二年二月下甲午条，《清实录》第６０册，第５６４页。

④　李根源：《永昌府文征》卷２５《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抄》，昆明：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晨光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７２０页。

⑤　《赵尔巽致电赵尔丰准云贵总督李经羲电陈滇缅界务关系边、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８３２－８３３页。

⑥　《滇督李经羲因划线事致赵尔丰电》，平措次仁、陈家琎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2集，第１９页。

⑦　《致滇督李经羲已派员往近缅处勘界电》，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４９６页。

⑧　《致川督英藏新订条约不致以滇督界务相牵涉波密宜早收电》，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４９６页。

⑨　《收复桑昂曲宗等地设官分治并请奖出力人员弁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８３４页。

的野人山一带查勘山川形势，绘图查界，宣慰边民，以备设治。夏瑚在阿墩子弹压委员任内，曾深入怒江、独龙江一带游历考察，其足迹远至今缅北葡萄等地，沿途安抚民众，争取民心，对滇缅边务情况探悉甚详，回到阿墩子后著有《怒俅边隘详情》，成为了解怒江、独龙江流域及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①此次夏瑚一行赴察隅，由科麦启程，沿察隅河一路南行经过察隅、压必曲龚，然后转西北来到原梯龚拉、甲穹、木牛甲卜、且菇、妥坝等地，再由妥坝东北行折返科麦。②夏瑚等人从１９１１年7月１６日出发到１１月２８日返回，历时四个多月，在中缅印交角的野人山一带宣抚慰问，穿越深山峡谷，查勘山川形势，摸底风土人情，委官任命，安抚民心，争取民意，为巩固西南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片马事件后李经羲和赵尔丰在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区勘界问题上的合作应对，起到了彼此提醒和相互支援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川滇边区联防的作用和贡献。

四、　川滇边务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清末川滇边务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有做进一步澄清和诠释的必要。

（一）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和联治，不仅有其名也有其实，是川滇边务的有机组成部分

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和川边改流，是清末应对西藏危机的重大举措，不仅有利于巩固国防、抵御外辱，而且对西藏及康区的历史走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学者对赵尔丰及其主导的川边改革予以高度评价和持续关注，清末川边改流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但是相较于对川边改流和赵尔丰治边的丰硕研究，以川滇边区为对象的清末川滇边务问题却尚未有学者进行系统梳理。事实上，从以上整理的相关情况来看，清末以来围绕“固川保藏”、“筹边援藏”战略的讨论与筹划，川滇边区间的联防与联治始终是其中重要一环；赵尔丰就任川滇边务大臣后，根据清廷的战略布局，从设官、巡防、屯田等多个方面对川滇边区的整体治理进行了规划和设计。在全力推进川边改流进程中，边军左营三次哗变，特别是前两次大规模哗变，川滇防务压力遽增，但在川滇之间有效联防中得以很快平息，稳定了边区局势。在英军悍然入侵滇西片马、引发滇缅北段界务严重危机之时，得益于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有力支持，滇省和川边协同联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英军在滇缅北段野山人一带的扩张。在这些实质性的川滇边区事务处理过程中，滇、边、川之间声气相通、互为支持，共同推进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有力协助了川边改革的顺利推进，协同巩固了西南边境国防。因此，清末川边新政推进过程中，川滇边务大臣不仅有其名，也有其实，在清末川藏边务和川边改流研究中不应忽视。

（二）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设置以“声气相通，联为一致”③ 的联治与联防为指向，但实际运行的主要特征是联防

晚清西南边疆危机由马嘉理事件开始加速，逐渐从滇边波及藏边和川边，１８８８年英军入侵

①　具体情况详见夏瑚：《怒俅边隘详情》，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１２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６－１６７页。

②　《夏瑚日记》，收录于刘赞廷《西南野人山归流记》中，平措次仁、陈家琎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2集，第２０－３０页。

③　《川滇边务请划清办事权限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西藏后，藏边危机又逐渐向川边和滇边扩散，川滇藏毗连地区成为多重边疆危机冲击影响的叠合地带。从四川地方官员到清廷，对于该区域重要性的认识也逐渐随着边疆危机的不断深化而调整。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再到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其间一直贯穿着省际联防协力支持的治理思路。而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其名称已明确显示出突破省际畛域，从加强川滇边区的联防逐渐演化为通过川滇边区的独立建制，打通阻碍川藏、滇藏间交通交流梗阻，以达聚合川滇边区之力支援治藏之目的。简言之，其实就是川滇边区由联防逐渐升级为联治，再以联治推动联防，从而有效支持“筹边援藏”的实现。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下旨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到宣统三年十一月赵尔丰被杀于成都，五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清廷屡屡下诏要求滇督、川督、边务大臣同力维持，但是在川滇边务治理思路上的这一转变，却始终没有真正落实到将中甸、维西等赵尔丰所要求的滇边之地划归边务大臣管辖的层面上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赵尔丰在川边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再次向清廷提出川滇边务划清办事权的申请：“窃维时艰日迫，边务方殷，朝廷廑注西陲，不忘远略，特于川滇两界增设重臣，期以慎固藩篱，修明政治。……拟由川滇两省督臣先将界限划清，其归入边务大臣一部者，既地因受辖，而事可权宜于一时，抑才